

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

王维国 何深思 编著

XIESHANGMINZHU

YUZHENGZHIFAZHAN

XIESHANGMINZHU YUZHENGZHIFAZHAN

XIESHANGMINZHU YUZHENGZHIFAZHAN

ZHENGZHIFAZHAN

XIESHANGMINZHU YUZHENGZHIFAZHAN

ZHENGZHIFAZHAN

ZHIFAZHAN YUZHENGZHIFAZHAN 红旗出版社

YUZHENGZHIFAZHAN

YUZHENGZHIFAZHAN YUZHENGZHIFAZHAN YUZHENGZHIFAZHAN

XIESHANGMINZHU

北京市政治文明建设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2007 年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

王维国 何深思 编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王维国,何深思编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051-1562-0

I. 协…

II. ①王… ②何…

II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研究

IV. D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4342 号

协商民主与政治发展

王维国 何深思 编著

责任编辑:王农媛

责任校对:李彩明

封面设计:韦玉珍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727 地址: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hqcbs@publica.bj.cninfo.net

编辑部:64037149 发行部:64037154

印刷: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2007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48千字

ISBN 978-7-5051-1562-0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言	(1)
一、选举民主的优势与难题	(2)
二、国家政治管理难度的增大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发挥 政治协商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6)
三、政治协商的功能决定了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可 以发挥特殊的作用	(12)
第一章 代议制的实践及其困境	(15)
一、代议制的兴起与发展	(15)
二、代议制的困境	(20)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代议制度	(24)
第二章 政治参与理论对代议制的超越	(27)
一、政治参与的内涵	(27)
二、政治参与理论的兴起	(28)
三、参与民主的基本理论方式及其对代议制的批判	(30)
四、政治参与论的局限	(34)
五、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观	(41)
六、政治参与的本质	(43)
七、政治参与的特征	(44)

八、政治参与的类型	(47)
第三章 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及其基本理论主张	(50)
一、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	(50)
二、协商民主的实践渊源	(56)
三、远古民主形式的当代再现	(59)
四、协商民主的特征	(63)
第四章 中国政治协商的实践和探索	(72)
一、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	(72)
二、人民政协的运作机制	(76)
三、人民政协的作用	(79)
四、中国政治协商的实践和探索	(84)
第五章 协商民主基础上我国政治参与机制之建构	(106)
一、人类协商活动的基本领域	(108)
二、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	(114)
三、目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途径有待于进一步畅通、拓宽	(123)
四、注重公民参与人大工作中的协商环节	(128)
五、政治协商作为公民政治参与途径的继续拓宽与延伸	(136)
六、转变政府管理社会方式，引导社会协商领域健康 有序发展	(164)
七、合理利用网络途径	(168)
后 记	(172)

导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界兴起了对协商民主研究的思潮。“一些当今西方政治思想界的领军人物，纷纷表明自己对协商民主的支持态度，像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英国著名社会政治理论家吉登斯、德国思想领袖哈贝马斯等人，都是协商民主的积极倡导者。”“协商民主也是当代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发展之一。”^① 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民政协，对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实践探索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发挥政协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这必将使我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新阶段。基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背景的两种制度，在“协商民主”方面，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趋同，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引人关注的时代趋同。对于这一趋同如果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时空上的巧遇，则过于肤浅。实际上，这一时代趋同是当今世界不断努力丰富民主形式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在民主认同方面倾向一致的智慧选择。中国的政治协商把协商民主理念付诸了实践，为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积累了珍贵的经验，也展现出协

^① [美]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主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版，总序。

商民主发展的巨大空间和光明前景，这也是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协商民主是对政治参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是对西方以选举民主为基础的代议制的进一步发展。协商民主作为当代民主理论的新思维，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民主政治的认识，而且为我们构建公民政治参与新机制提供了新的基础和视野。因此，探求和分析民主转型及其所引发的政治发展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时代课题。

一、选举民主的优势与难题

选举民主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成熟阶段以后，走向了自己的巅峰时代的。伴随着选举民主的充分发展，其优势和问题也同样清晰地表现了出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为选举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社会庞大纷繁的市场运作体系、个人自主决策的机制、效率优先的决策原则和人生来平等的人文理念，对选举民主有着巨大的需要和渴求；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又根据自己的这些需要和渴求创造性地丰富、完善了选举民主形式，并且还将其作为一种民主的标准模式向世界各国广泛宣传和大力输出。

实事求是地讲，选举民主形式有其明显的优势，这也是这种民主形式畅行多年的原因。这些优势表现在：首先，“一人一票，人人拥有”，用最直白清楚的方式使公民体验到了民主权利的非排他性和公平性；其次，“少数服从多数”体现了服从大多数人意愿的原则；第三，代议制程序，使大部分民众有可能抽身政治过程，从而使各种决策提高了效率。然而，随着人们民主意识的不断提升，选举民主的“硬伤”开始逐渐暴露了出来。最突出的一点是，人们发现选举民主有时更多的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实质上的民主。也就是说，由于选举民主的着力点只是让民众决定管理者，忽视了民主的实质在于民众对于立法和决策的参与和协商。选举民主自身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

第一，选举民主有可能走向民主的反面。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已成为全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共同价值。所谓民主就是“主权在民”。选举民主是否真正能够实现主权在民呢？理论上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在实践中必须具有得以实现的保障条件。选举过程本质上是政治权力的委托代理过程。当人们行使了自己的选举权利，作为代价人们也就让渡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这样民主就转而成为少数人代理多数选民行使超大的政治权力的民主。如果此时无法保证代理者能够很好地完成选民授权的任务，实际上就等于选民基本上失去了权力。在选举中人民拥有的权力在选举以后就丧失了。因此，选举民主可能走向民主的反面，选举可能失去民主，这就是选举民主的悖论。

第二，缺乏少数人利益保护机制。选举民主以服从大多数意愿为原则，但是真正的民主是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少数人的权利也同样要求得到尊重。选举过程就是选择过程，选择服从多数人意见是正确的，因为这可以使大多数的利益得到照顾；但是选择服从大多数人意见的同时，也等于选择了对少数人利益的放弃，放弃少数人的利益同样也违背民主的真谛。少数人的利益不一定是合理的利益，以少数人利益为代价的选举至少是不完全的民主。选举程序本身无法对此进行救济。所以，选举民主也部分地否定了民主，是对不完全民主的退让和妥协。

第三，选举民主无法实现充分的民意表达。民主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就是人民的意愿能否得到充分表达，人民的权利能否得到充分实现和保障。这一标准在选举民主中很难完全实现。选举民主中，人们的意愿也可以表达，但这种表达受到两个限制，其一，自己的意愿只能通过他人间接表达；其二，自己的表达只有三种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前者的限制在于，无法确保自己的意愿能够被真实准确完整地转述；后者的限制在于，超出上述三种选择之外的意愿无法得到聆听和采纳。现在的问题是：即使完全排除了代

言人的主观疏忽和有意扭曲,由于理解程度、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或非亲身感受等条件所限,代言人客观上也是很难将当事人意愿表达得如同当事人一样清晰的。这种情况与人民意愿充分表达的民主标准显然还有很大差距。

第四,选举过程对金钱的依附违背了民主的初衷。在西方,选举是需要金钱支持的,这是一个客观问题。选举过程离不开金钱,但选举结果又要独立于金钱,不为金钱所左右。这是一对矛盾,也是选举的难题。金钱与权力有天然的亲和力,选举过程要想得到金钱的支撑,而选举结果又要不被金钱所支配、不与金钱做交易,就必须使用不需要权力的金钱。不需要权力的金钱是几乎不存在的。公权背景的金钱相对单纯,可以增大投入比重,但也难以排除被操纵和被滥用的可能,所以最后一道屏障就是建立公开严格的监管制度。在西方各国的选举过程中,权钱交易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减少私人金钱投入和设立严格监管的措施已普遍实行,但是,庞大的选举资金的需要使选举民主过程还是充满了金钱味道,这使得通过选举实现民主的选举民主形式,从一开始就显得令人疑惑。这就要求选举民主不断修正和完善。

鉴于上述选举民主存在的问题,“人们也设想了一系列化解的办法,包括:借助宪法赋予公民以必要的权利,如果公民利益受到侵害,可通过维权行动来抵抗和矫正不良侵害;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舆论独立,使公民通过舆论监督机制,表达自身利益,评价公共政策,约束不当行为;建立责任政治和弹劾机制,对于严重违背公民利益的政治人物启动罢免程序。”^①

这些设想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实际的效果却并不理想。在现实政治中,公民真正能够有效地采取有组织地抵制政府决策的行动

^① 燕继荣:《协商民主的价值和意义》,《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6期。

比较困难。常见的现象往往是，政府的决策可能一味地照顾了部分民众的利益（情绪）而忽略了另一部分民众的利益（情绪）。针对政府的“不公”，民众确实可以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自由地发表意见，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但是他们的批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决策层所采纳，这是一个说不准的事情。况且，所有这些办法和设想都不过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事后”补救，并没有立足于“事前”防范以建立一种“流程控制”的有效机制^①。美国反战人士对于布什伊拉克战争政策的无奈，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选举民主所存在的不足。因此，政治学者开始通过历史的回溯和理论的反思，积极探索新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继参与民主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逐渐成为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方向。

民主的转型，即协商民主的当代兴起，意味着民主形式的多样性和全面性将是未来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过去的一个世纪曾经是选举（自由）民主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纪。虽然，选举民主制度在其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其问题也暴露无遗。实践证明，这些问题有些可以得到解决，有些靠其本身是难以克服的。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使得人们对自己享有的民主权利并不满意，人们普遍感到民主理想与民主现实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而人们对一味追求一种民主模式产生了动摇。协商民主思潮的兴起，就是对人类是一个中肯的提醒：民主不应局限于一种模式、一个类型，如同每一民主形式的实施一定要与本国的历史、国情及发展阶段相适应一样，多样性的民主模式也一定会给政治的发展以充分的支撑和多样化选择。正因为如此，在协商民主方面，中西社会形成了某种趋同和契合。因此，未来的世界民主进程的走向可能是多种民主形式的复合。

^① 参见燕继荣：《协商民主的价值和意义》，《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6期。

二、国家政治管理难度的增大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发挥政治协商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国家政治管理指国家政治机构及其核心力量对社会的管理和引导。一个国家政治管理的难易程度取决于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主观方面，取决于国家治理力量的能力和政治体制设计的水平是否高超和科学高效。客观方面是指国家自然规模的大小、经济总量的多少、发展速度及所处阶段与国际环境的影响。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自然规模越大，经济总量越多，发展速度越快，所处国际环境越复杂，其政治管理的难度就越大。以此来看，中国目前正在步入政治管理难度不断增大的时期。

（一）新中国建立后的国家政治管理

中国的自然规模无疑是巨大的，无论从国土面积、自然环境，还是人口数量、国际的区位来讲，中国都堪称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国。管理这样的大国，当然比管理一般小国具有难度。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可观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世界排名第四，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一个大国中运行一个巨量的经济体，其管理难度必定成倍增加。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遇到的所有社会问题几乎都是未曾经历的，只能小心试水。这进一步加大了政治管理的难度。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国际政治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民族宗教矛盾日趋激化。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要平衡与各国的关系，获得对自己最有利的国际地位，显然需要极高的国家政治管理能力。正是上述四个客观因素的叠加给我国的政治管理提出了少有的难题。

国家的政治管理更主要的是要建立在对本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构成成分和构成方式深入了解和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处于高速发展期的中国，其社会阶层构成还远没有达到稳定状态，各阶层的组成仍在不断分化。面对这样一种阶层结构不断变化的社会，要求对其

在短时间内就能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也是有一定困难的，这也大大增加了国家政治管理的难度。

毛泽东所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准确判断的一篇文章。它是建党初期毛泽东深入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成果。由于这一分析以及此后的一系列研究判断准确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的阶级构成，从而解决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正确指导了中国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彻底摆脱了一百多年受外国列强奴役的历史。作为这一范例的延续，全国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再次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新的科学分析，明确了谁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人民民主的阶级基础是什么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顺利完成了建国初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巩固了社会主义新政权。

1956年以后，我国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已经注意到国内社会阶级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也明确提出过“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①可惜这些科学分析没有被重视和坚持下来，更没能融入我国政治管理的观念、政策和行动之中。“文化大革命”甚至错误地将人民内部在发展中的矛盾上升为“阶级斗争”，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反思这段历史，有两个突出的教训必须记取：第一，必须加强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和科学判断。1936年，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制定了新的宪法。该宪法认定：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判断对中国影响很大。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改革开放之前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上认同和照搬了这一社会结构划分理论，并据此制定了一些不符合国情的政策。实践证明，这一判断忽视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各群体的分化，忽视了他们在利益诉求方面的差异性，从而使激活生产力的基本利益需求受到不当压制，从而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正常发展，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损害。第二，在对各阶级之间关系的分析中，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使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出现偏差，从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转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本应埋头经济建设转为埋头阶级斗争，贻误了将近20年的经济建设黄金期，引发了一些互不信任、出身歧视等社会问题。可以看出上述两个教训都出自一个根源，即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认定和社会阶级间关系的分析出现判断失误。这些事实说明，科学地判断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确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制定正确的国家政策和策略、保证政治管理顺利高效的根本性基础。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变化的特点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很快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重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尽快实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给予社会各阶层群体的不同利益以极大的关切。在这种条件下，我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开始加快。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一批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中国这样的大国出现多阶层分化并不奇怪，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在短时期内社会阶层的迅速变化中有

几个特点值得特别关注。第一，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在改革开放后，从当初的两三个阶级阶层迅速增加到多个阶层，增长近三倍，大大超过一般社会阶层形成发展的正常节律。社会阶层之所以出现集中重组、分化，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曾长期人为地将社会阶层结构控制在两三个层次之内。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的快速分化带有一定的“回补”性质。这样的回补显然会给政治管理带来一些困难。第二，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仍在进行当中，并未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只要中国社会经济继续处于强力增长期，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的势头就不会减弱。这种处于动态当中的、还未成型的不断发展的社会结构，对于期望尽快摸索规律、积累经验的当代政治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第三，国际经验普遍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形成两头小、中间大，以中间阶层为主的橄榄型时，其社会经济发展才将进入健康稳定发展期，其政治管理的难度才会降低。而我国当下的社会结构则大体呈现为正三角形，底层巨大。这种结构本身就有着治理上的难度，再加上还要将其调整引导到“橄榄型”结构，政治管理的任务将更是长期和艰巨的。

（三）当前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管理的影响

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复杂的国际关系给国内的政治管理也带来一定影响。冷战结束之后，各国之间的交往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阵营之间的划分就是确定国家间敌友关系的红线和标尺。处于不同阵营的国家，只要按照红线划分原则处理国际关系就大体不会有错。但是冷战结束后，两大阵营解体，客观上划分敌友的标志模糊化，这给各国的国际交往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国际交往的复杂性也日趋上升。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一切均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处理这种不敌不友的国际关系时，只能根据具体时间、具体情况、具体环境、具体问题以及具体对象来灵活处置。

我国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对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处置是我们

要必须面对的问题。此外，处于高速发展期的中国，还有如下一些特殊的问题需要面对和处理。第一，意识形态的差异使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中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意识形态多种多样，其中最为明显对立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形态。持不同理念的国家之间曾经历过长时期的矛盾、战争以及长达几十年的冷战状态。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挫折，一批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倒向了资本主义。这一变局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处境更加不利，西方敌对势力也更加集中地把矛头调转对准中国，希望攻破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后一个巨型堡垒。尽管和平与发展已经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存在仍是西方世界所不愿乐见的。实际上，西方敌对势力一天都没有放松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企图和战略。只不过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面前，西方的活动变得更隐蔽和不露声色。他们利用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机会，竭力向世界各国推销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时在“民主”、“人权”、“民族”和“宗教”等问题上大做文章；同时，他们又利用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媒介科技优势，对中国进行精神和文化方面的渗透。尤其是随着中国国际交往的加深，在尊重和顺应国际经济规则的同时，如何剔除夹带而来的政治规则的影响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在全球化的开放环境中，我们已经面临着法律法规的修改、政府职能的转变、组织人事制度的改革、治理模式和社会转型等深层挑战。这些都会给我国政治管理制度的质量和水平带来严峻考验。

第二，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明显不适应极大地增加了我国对外交往的难度。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已经表现出对这种变化的明显不适应。这些不适应表现在多方面：首先，对中国定位的不适应。过去印象中贫穷落后的中国，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显示出富有而繁荣，经济排位连连提升，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现状认知心理的严重不适应。其次，交往层次的不适应。过去与中国各方面交往停留在小规模、低水平层次，而今在大规模、高层次国际合作中不断出现中国的身影。中国逐渐进入主流经济领域，引起了国际社会相应准备不足的不适应。再次，竞争对手变化的不适应。过去，中国在经济领域还不构成与西方大国的直面竞争，而今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新的竞争对手，而且由于经济上的成功，其政治上的效仿和追随者也在增多。这引起国际社会在竞争环境和格局上的不适应。这些不适应不但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警惕防范之心，而且在与中国交往中消极敏感，甚至设置障碍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近年来，“中国威胁论”一再被提及，还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言论。中国产品连续被多国提出“倾销”诉讼，海外的中国货物及中国商店也不时有遭到毁坏和查封的消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民币升值和改善贸易顺差的多重重压。就连中国的海外华人、华侨、留学和务工人员遭遇到的暴力事件也在增多。这些事件都给国家政治管理水平提出了考验和难题。

第三，国际事务发言权的竞争，使中国必然走进一些国际矛盾的中心和前台。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需要相对独立的空间和位置，因此，争取一个和平公正的国际环境十分重要。争取和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前提是国家的实力和国家的作为。在国家实力一定的条件下，争取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就成为一个国家争取国际事务发言权的关键因素。尤其是面对世界上一些棘手的问题，分析能力、处置能力、决断能力及与他国的合作能力十分重要，这些问题也同样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管理的品质和水平。正因为国家政治管理面临种种困难和考验，因而我们必须通过政治发展来提高政治管理水平。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协商在我国政治生活的作用。

三、政治协商的功能决定了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建党已经 80 多年，执政 50 多年，而且将长期执政。然而，执政党的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大国要实现长期执政需要满足很多条件。在各种条件中，除了要搞好党的自身建设、打好执政基础之外，对长期执政地位本身所面临的一些客观问题和困难也必须给予充分的认识、冷静的分析和长久的打算。这些问题和困难的解决和克服除了靠主观努力自行克服外，还须借助其他力量，其中政协组织及其政治协商就是其他力量中最重要的一支。

第一，长期执政需要外部视野的补充。中国共产党能够实现长期执政，可以大大增强国家运行的稳定性、减少波动性；可以保持不断前进、减少停滞倒退；可以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可以加强国家团结，减少不必要的纷争。然而，长期执政对党的自身建设来讲，也会遇到一些问题，那就是角色单一可能导致视域单一的局限。也就是说，如果长期以执政党的眼光、执政党的姿态和执政党的思维，去看待、分析、思考、理解周围的事物并据此处理问题，有可能出现不够全面、不够周到、不够准确的执政判断，而政治协商正可以弥补这一局限。首先，人民政协的主体是非执政党。非执政党的地位、角度、视野和思维恰好能够弥补执政党在上述方面的空缺和不足。其次，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安排中，各党派和人民团体能够毫无保留、畅所欲言地协商献计。再次，在政协制度中，执政党和非执政党可以直接对话协商，表达过程没有中间环节介入，不会失真或曲解，这种沟通环境更进一步加深了执政党对非执政党以及其他群体的理解，从而真正弥补执政党单一角色的视域局限问题。

第二，长期执政所产生的干群矛盾需要外部分散化解机制。中